

科学社会主义
活页参考资料

(7)

校内使用

中国人民大学
科学社会主义系资料室

说 明

这里选译的材料，是英国工党著名的改良主义理论家柯尔所著《第二国际》（1889—1914年）一书的前言、第一章——早期的第二国际（从第二国际成立叙述到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和第二章——后期的第二国际（从第二国际1900年巴黎大会到1916年昆塔尔会议）。是该校原编译室陈叔平同志从该书的英文本译出的。

柯尔的《第二国际》一书是他的多卷本著作《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第三卷（分上下两册）。其第一卷是《先驱者的社会主义思想》（1789—1850年），第二卷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它虽然提供了较丰富的材料，但有许多观点不尽正确，望读者在参考时注意，引用本译文时，务请校对原文。

目 录

《第二国际》一书的前言.....	1
早期的第二国际.....	9
后期的第二国际.....	47
(一) 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	47
(二) 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56
(三) 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71
(四) 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87
(五) 巴塞尔代表大会.....	99
(六) 1914年——维也纳和巴黎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的崩溃.....	102

《第二国际》一书的前言

在本书第二卷里（指作者所著的多卷本《社会主义思想史》一书的第二卷——译者），我叙述了从19世纪中叶（从欧洲1848年革命的失败）直到1890年左右（这时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和许多非欧洲国家里都建立起社会民主党和工人党）这段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活动的发展。在本卷里，将要从第二国际在1889年（法国大革命百周年纪念）成立时起，论述到1914年8月欧战的爆发。第二卷所概括的时期，其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直到1889年还未结束；但它已经不再是这个时期的中心问题了，这时候，斗争的双方都起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整个西欧已经采取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同时许多国家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政党。这些政党有的在选举方面进行积极的活动并设法通过立宪手段来树立其议会力量，有的（在选举权限制过严以致使这些政党很难在竞选中取得成就的国家里）则为争取男子以至成年人的选举权而进行宣传 and 斗争，以便能够跟上述国家的政党并驾齐驱。至于无政府主义，它深深地受工联主义发展的影响，并体现为起初称为革命工联主义、后来则干脆称为工联主义的一个部分。它在大力宣传直接行动的基础上，以总罢工作为武器来跟议会活动相抗衡。总罢工同时也被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并利用来作为加强进行选举改革的一个武器；而在俄国，1905年革命是通过总罢工这种形式开始爆发的。然而在奥地利和比利时，总罢工则是强行

争取选举制度的一种手段，这无论跟无政府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所倡导的“社会”总罢工或是跟俄国革命者所进行的总罢工比较起来，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说：这种总罢工并不是要导致暴力革命，而是要争取有限的立宪改革，从而为争取有效的立法活动扫清道路。同时可以看到，这种罢工是在社会民主党指挥下的一种有纪律的行动，而不是一种可以由罢工斗争者把大部分工人推向革命行动的自发的群众运动。然而甚至这种有限的总罢工形式，也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拥有无论在力量上或是在组织上都比其他国家远为强大的社会民主党，他们享有最高的威信。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负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维护者的盛誉；另一方面是他们对于俾斯麦想通过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来打垮他们的企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法令一直到第二国际成立的时候仍然生效，但次年便宣告废除。于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便得以在德国土地上合法地重建其组织，并于1891年通过了一个新纲领——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对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起了巨大的影响。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德国工会运动高度地联合起来，并对该项运动进行有效的领导。德国工会运动，在名义上是脱离德国社会民主党而独立的，但实际上却顺从地服从它的领导。在新的国际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德国工会运动是独一无二的最强大的力量。在实力和影响上仅次于德国的是法国。然而在1889年，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分裂为许多互相磨擦的派别。在法国不仅有敌对的社会党，而且还有敌对的工会运动，甚至当敌对的社会党在国际压力之下于1905年实行合并的时候，工会运动也丝毫没有打算仿效社会民主党的意思。在第二国际的历次会议上，法国代表团内部一直是尖锐地对立，而

德国代表团则永远代表一条坚强团结的阵线。

居于德国和法国之下的是俄国，虽然俄国人并没有群众组织，因为他们不像某些国家那样能够公开和合法地进行组织工作。事实上，一直到1905年，俄国人并没有在国际事务上起重大作用。即使在1905年后，他们内部还继续发生急剧的分裂。这种分裂不仅出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而且还出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内部，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然而，俄国人在这样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都是革命者，因为在沙皇专制制度面前绝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的确还出现了一种议会——杜马。然而选举条件使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机会在其中获得实际的代表权，在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者的力量都非常薄弱。在沙皇俄国，是有可能仿效德国或任何西方国家的榜样建立起一个主要从事议会斗争的社会党。虽然在国际历次会议上，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们一直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看作是继承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主要代表。但由于他们本国的情况跟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而后者的问题却又在国际会议议程上占主要地位，这就使他们无法参加会议的许多讨论。他们的最重要的一次发言是在1907年斯图加特会议上所作的。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对社会党人在世界大战爆发时所持态度的决议案进行了补充。

跟英国的国际地位相形之下，英国社会党人在国际中所起的作用是比较小的。这一则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再则是这个运动比较晚才发展为一个有力的政治运动。英国工联代表大会虽然派代表参加国际，但在其中不起多大作用，并且也几乎没有认真地履行其成员义务。至于工党，即使在它参加英国支部以后，也没有多大作为。在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和凯尔·哈第的独立工党之间的争论，已经从国内扩大到国际，英国代

表团则高踞于这两派之间。凯尔·哈第由于提出了以总罢工来反对战争的主张，这使他成为1905年革命以后的一个主要人物。除他之外，没有任何英国代表给人们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海德门由于强烈地抱着所谓德国威胁的观点，这使他不能起什么领导作用（尽管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际中，英国因为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统一的社会党，以及它的工人运动缺乏对国际阶级斗争的忠诚而不断地受到指责。

在一些次要的党中，奥地利党和比利时党最为活跃。维克多·阿德勒和艾米尔·王德威尔得都是杰出的国际代表人物。奥地利人总的说来是跟着德国走，但对反对派却极易抱调和态度。比利时人是条顿人和拉丁人之间的最好的中介人，特别是在工联和合作社对待政党的态度的问题上。意大利人跟法国人一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荷兰人也是如此。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党还没有取得它们在1918年后所取得的那种重要地位。代表西班牙的只有巴弗罗·伊格列西亚斯的小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党忠心耿耿地跟着德国社会民主党走。巴尔干诸国只有小型的而且大多数受严重迫害的社会主义政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保加利亚党尖锐地分裂为敌对的派别。美国也同样分裂为两派——德·里昂尼特斯派和温和社会民主党人，但任何一派都没有巨大的实力和影响。其他非欧洲国家的政党则间或露面而已，它们对国际的事务起很小的作用。通常的情况是，德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以及比利时人主宰着会议的讨论，英国人、意大利人和荷兰人则次之，俄国人只不过偶而发表意见而已。

在编写第三卷时，势必要在很大的程度上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情况。因为在1889—1914年这段期间，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主要是按照民族的路线发展的。每个国家的社会

党和工会运动，每当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实现了若干组织措施以及其他有效的措施以后，就会遇到自己的特有的问题。它们必须设法满足它们的广大的支持者的要求和保卫他们的利益。这无论对于竞选的成就或是对于工会组织这种可以指望的力量的团结来说，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国际的领袖们承认——尽管有时不无遗憾的表示——有必要给予每个国家的政党以广泛的活动余地，以便根据本国具体的工作条件来制定其政策和纲领。从第二国际的全部活动来看，它不过是一个由若干国家的党派团体组成的纪律松弛的组织，它对其成员的约束力非常有限。实际上，它只有在征得广泛的同意以后，才能就某一政策作出决议。为了使决议能够获得积极的支持，至少是得到主要代表团的同意，它往往小心翼翼地修改自己的决议。特别是，它不能对德国代表们的举足轻重的票数置诸不顾。德国人的富有纪律的团结，实际上使他们拥有一种不受限制的否决权，虽然这种力量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下都使他们的意见占上风。

在国际的早期，其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非常之广，但没有任何问题是突出的。后来出现了米勒兰事件——德雷福斯案件的产物，于是便就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是否正当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考茨基巧妙地起草了一个决议（即人所周知的考茨基决议），于是避免了一场分裂。此后，国际所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加强社会民主党（首先是法国）的团结。当法国的对立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被撮合在一起的时候，俄国革命也在当年爆发。于是国际又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转向帝国主义各大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国际以后便继续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1914年欧战的爆发。这时候国际企图压制各大国的工人阶级的爱国热忱的作法彻底宣告失败，而它

的机构本身也就分崩离析。

然后，出现了战争的产物——1917年俄国革命。由于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建立，重新建立一个共同的社会党国际的可能性便消失了。因为这种新的形式的共产主义，完全排斥一种纪律松弛的联邦制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是要在一团和气的基礎上，使形形色色的派別能够在单一的国际组织內共存。而新的民主集中制的信条（不仅在每个国家內，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则跟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所发展了的议会社会主义绝不相容。战后，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竞选力量都大大加强，这些政党绝不打算放弃它们所追求的议会势力，转而接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世界革命。因此，当俄国人准备建立第三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工具时，社会民主党和工人党也准备重新把1914年瓦解的国际建立起来。奥地利人及其在所谓“两个半”维也纳国际中的同盟者，一再想把第二和第三国际的成员拉到一个共同的组织中，这种企图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这绝不是偶然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只有一个具有高度纪律的国际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对于旨在通过合法手段来争取议会势力的社会党来说，只有一个纪律松怠的联邦制的国际才能符合它们的要求。因为要争取广大选民，就必须把尽可能广泛地反映人民切身利益的要求列在纲领的首要地位。而这些要求在每个国家都大不相同。而在同时存在着广泛的选举自由和对议会负责的政府的国家里，这些要求尤其不宜具有革命的性质。在这种条件下，议会社会党便不由自主地顺着“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公开的社会革命发展。同时，它们的国际主义，也不能超过它们为了取得议会势力而必须争取的基本选民所能接受的程度。

这一切在今天看来，要比四五十年前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在

同一个国际组织中活动的时候清楚得多。在1914年前，既有广泛的选举自由、又有对议会完全负责的政府的国家，为数寥寥无几。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有限的几个国家。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有广泛的选举自由，但没有责任政府。俄国人则两者都没有。意大利仅仅在1914年战争前夕才放宽了选举限制。而在西班牙和其他一些落后国家里，选民名单以至选票都是由当局操纵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在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清楚地划一条界线。在俄国，甚至温和派也不得不成为革命派。而无论德国人或是奥地利人，都不能仅仅成为立宪派，因为他们都面临着专制制度，而单凭立宪手段是不能成事的。虽然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实际上是改良主义者，但他们继续声明自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心。只有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和霍亨索伦及哈布斯堡王朝垮台以后，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分界线才清楚地勾出，世界工人阶级运动才分割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部分。这与其说是给世界革命打开大门，毋宁说是给法西斯主义打开大门。然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们相信，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话，他们的俄国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

关于本卷的书名，我考虑了很久，最后才定为“第二国际”，因为我再也找不出其他适合的名称了。“社会民主主义与工联主义”这个名称看来太狭隘，虽然我曾经想使书名能够反映直接行动跟议会行动相对立的这个主题。“革命或是改良？”也不行，因为我已经说过，直到1914年为止，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界线还没有划得很清楚。至于我已选定的名称也是有缺欠的，因为它完全强调了建立国际的各国党，而将工联以及参加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其他派别排除在外。但是，这毕竟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名称，它无论如何能够精确地概括了

我所要叙述的那个时期。虽然在个别场合下我认为有必要追述1889年以前的事情或是把某一个特殊的运动的历史伸延至1914年以后。至于下一卷书，如果我还能够继续活着来写它的话，将要叙述到1939年为止。

早期的第二国际

18世纪80年代末，许多欧洲国家都出现了社会党（至少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些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仿效德国社会党而建立的。同时，对于这些社会党来说，把自己联合为一个新的国际的时机，看来也已到来了。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分裂以后，第一国际留在欧洲的摊子已由联邦主义者接收，他们反对马克思的权威领导。然而，我们知道，联邦主义者（通常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在70年代期间逐渐消亡。1877年，他们在比利时发尔维亚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同年社会党根特联合代表大会以前不久召开的，其目的在于重建一个统一的国际。在根特大会上，在无政府主义者和政治行动派之间的众所周知的斗争又展开了。那些道道地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得到了多数票，于是便决定在发尔维亚建立一个国际通讯统计局，面向一切不同见解的组织。但这个机构一直没有建立起来。鉴于代表大会所反映的意见分歧是不可调和的，主张采取政治行动的大部分人便单独召开一个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会议，并建立一个联邦局，对召开下次代表大会的事宜作了指示。在这个决定以及跟无政府主义集团实行决裂的决定上签名的人当中，有赛撒·德·佩普——联邦主义者国际的领导人物，以及威廉·李卜克内西——德国党的代表。其他签名者有赫尔曼·格雷利希——苏黎世社会民主党领袖，路易·贝尔特兰和其他若干比利时人，米兰的赞纳德里（他脱离了他的意

大利伙伴们），匈牙利的列奥·弗兰克尔，法国的安德列·贝尔，以及英国代表约翰·黑尔斯和巴利·马尔特曼。

事情的这种发展情况预兆着第二国际的出现。虽然根特的联邦局于1881年在瑞士的克瓦勒召开了一届国际代表大会，但是事情也就到此为止。李卜克内西和贝尔特兰以德国党和比利时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克瓦勒会议；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还有法国工人党（贝诺阿·马隆和茹尔·约弗林，他们两人都是前巴黎公社社员）以及美国社会工党（P·J·马克居易，木工协会书记）。然而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来自德语瑞士，包括忠心耿耿的老战士J·P·贝克尔（来自日内瓦），保尔·阿克雪里罗德（来自俄国，以兄弟党代表身份参加）；同时还有为数不多波兰人（代表流亡者组织）。英国和荷兰，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没有派代表来参加。那些没有被邀请出席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在为他们自己的伦敦代表大会奔忙。在那个大会上提出了建立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国际的建议。

克瓦勒代表大会虽然经过广泛的讨论，然而所得出的结论是建立一个社会党国际的时机尚未成熟。除了德国以外，还没有任何国家建立起十分健全的社会党。虽然比利时已在顺利地建立这样一个党。德国党在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压力下，无法在国际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在法国，茹尔·盖德的工人党只不过在建立的过程中。根特代表大会在它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协议中，决定要成立一个工会国际，并为此召开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但没有人动手去召开这种会议。德国社会党人也不需要这种会议，因为这种会议将无法排除反对工人阶级采取独立政治行动这一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或温和的工联主义者。可见，克瓦勒代表大会找不到后继者，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党国际的思想，虽然从来没有放弃，但其实现却茫茫无期。

然而，在法国的倡导下，恢复国际的试图很快又重新开始了。在80年代初，法国工人运动很快地恢复起来，但这个运动分裂为许多敌对的集团。1882年左右，盖德的工人党完全建成，并在实力上大大地压倒工会运动。反对盖德及其马克思主义者的是以保尔·布鲁斯为首的反对派。布鲁斯在1882年建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并拥有大量的工会支持者。1883年，可能派首次在巴黎召开一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像在80年代期间所召开的大多数法国工人代表大会一样，其成员极为混杂。它面对各种各样的团体，其中既有产业组织，也有政治组织，代表形形色色的思想倾向。这次大会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完成了什么工作，而在于它的召开符合于各国正在发展的工人阶级运动要求联合一致来改善工作条件（特别是缩短工作周）的愿望。这个目标在1886年可能派在巴黎召开的第二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则更要明确得多。这时候，主要问题已经是如何在尽可能多的国家里同时采取行动来实现8小时工作日。在美国，为八小时工作日进行相当广泛的宣传鼓动。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熟练工人利用“金热潮”以后劳动力奇缺之利，在以举行总罢工为胁迫的情况下，早在1856年就实现了八小时工作日。资方所作的这种让步，不久以后也在其他各洲实现，但由于并没有在法律上得到承认，这种让步还不是普遍的。70年代末，曾经为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进行鼓动。1885年，通过了为妇女和儿童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立法。出席巴黎代表大会的一个澳大利亚代表，约翰·诺尔顿，曾提请代表大会注意上述的成就。美国在这方面的发展紧紧跟着澳大利亚而起。在美国，在依拉·斯图亚特倡导下建立起来的八小时工作日同盟（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后来的经济萧条而宣告瓦解。而到1883年，劳动骑士团把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列为其

当前纲领的一部分，在1885—86年间，曾经为实现这项要求举行过许多地方性的罢工。在巴黎大会上，布鲁斯分子维克多·达尔曾提出一个报告，建议制定一项国际劳工法来补充上述要求。这项建议得到他的可能派的同志——西蒙·德雷尔以及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代表爱德华·安塞尔和赛撒·德·佩普的热烈支持。这两位代表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劳工组织，把八小时工作日作为它的第一个目标，并提出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应当在1889年召开，作为纪念法国革命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同时在大会上产生上述新的劳工组织。这个建议被通过了，并委托法国可能派政党筹备这次会议。唯一反对这个建议的是英国代表，他们并不是对缩短工作日的意愿有什么异议，而是反对为此制定立法。他们在这个重要问题投票时弃权。法国代表紧接在国际代表大会之后在里昂召开了自已的劳工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雷蒙·拉汶（1851—1930）和波尔多的安东·茹尔德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进行了宣传鼓动，他们得到雄辩家让·多尔迈的支持。在里昂代表大会上为实行8小时而进行的鼓动，是跟无政府主义者实行总罢工的主张有联系的。这个主张是，如果政府和资方拒绝实行8小时工作日的話，那么工人们应当举行总罢工来施加压力。这种政策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多数人愿意起初在同一时间内举行一系列的示威行动，以便向资方和政府当局提出要求，并为此停止工作一天；而少数人则坚持认为从政府那里得不到什么东西，而示威游行除了教育工人们准备迎接更富有斗争意义的行动之外，是不能起任何作用的。

以后，正如我们在后面章节所看到的，法国工会日益对准备总罢工表示关心。一些人把总罢工理解为工人起义的一个公开行动；另一些人则把它理解为不通过“资本家”国家而争

得经济让步的一种工具。到1888年，与实现八小时工作日要求有明显联系的运动得到广泛的支持，而在下一年前一段时期，为同时发起罢工一天的活动加紧进行准备。

同时，对下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进行了筹备。这次大会于1888年在伦敦举行，参加者有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和社会主义者（包括约翰·白恩士，安尼·贝赞特，汤姆·曼以及凯尔·哈第等）。英国工联代表大会曾经不顾议会委员会的反对，参加了1883和1886年的国际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对于工联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的意志，不得不加以尊重。当法国请求议会委员会担负1888年国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时，后者起初坚持把这个问题交付工联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讨论，并且印发一个小册子，猛烈抨击大陆工会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靠。当代表们不顾他们的反对，而责成他们组织这次国际会议时，他们便制定了旨在排除社会主义团体的条例，以便使这次大会变为纯粹探讨工会事务的会议。这一来，便剥夺了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社会主义者联盟以及大陆的各国社会党出席会议的权利，但并不能排除代表工会团体出席会议的社会主义者。德国人实际上被排除了，然而比利时人、法国人、两个丹麦人和一个意大利人（米兰的康斯坦丁·拉查理）出席了会议。会议是吵吵闹闹的。由于缺乏有关这次会议的正式报告，要想知道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容易的。然而，会上无疑作出了一项为实现从法律上规定8小时工作制而进行国际宣传鼓动的主要决议，并决定于明年国际博览会召开期间在巴黎召开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以便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国际组织。

由于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领袖们尽力使1888年伦敦代表大会变为非政治性会议，因此这次会议便离开了以往几次会议的常轨。这使大陆的社会党人——特别是德国人、法国盖得分子

以及比利时人——感到非常恼火。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跟他们同盟者着手筹备他们自己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定于次年在巴黎召开。另一方面，法国可能派也发出了他们在伦敦大会上决定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邀请书，但邀请对象并不受英国工联领袖所制定的条例的限制。当然，这使情况亟度混乱。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在海牙召集了一个会议，希望把两个敌对的代表会议联合在一起。但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反权威主义者之间发生尖锐冲突的情况下，这种善旋工作便宣告破产，结果两个代表大会都召开了，并通过了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有关从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这种如出一辙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的影响。两个美国代表团（都是印刷工人团体）出席了可能派所召开的代表大会。同时，虽然没有美国代表团出席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大会，然而，休·马克格里哥里（后来是海员工会书记）则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代表大会，并向大会转达了美国人的意见。这种意见乃是最后通过的决议的基础。

这时候，美国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领导权已经从劳动骑士团的手里转到美国劳工联合会手里，后者在赛米尔·龚帕斯的扶植下，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1888年，劳联决定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开展一个新运动；过去每一年，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在全国各地展开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自发罢工，罢工者从在业工人那里得到经济援助，这样一直到每个工业部门都进行了罢工，从而争取到广泛的让步。当时，利用五一节的机会来发动一个激进的工人运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但美国人的想法其所以认为有必要在这种场合下提出这个问题，并在两个巴黎代表大会上把它列入大会的决议案，只能是劳联所决定采取的新行动的直接后果。实际上，在这两个代表大会